

# 现代科幻文艺对技治主义的敌托邦批判

邬晓燕

**【摘要】**科幻文艺从早期萌芽发展到现代形态,曾经以其主题纷呈的乌托邦愿景引领现代技术治理社会的现实建构。然而,20世纪科幻文艺显现出一种忧惧晦暗的敌托邦叙事转向,聚焦于对技治主义的多元批判,涵盖从发达工业社会的极权统治危机、科技理性的失控危险、生态末世灾难、“造物主”的主体困境到人机交互社会的异化魔景等立体审视。科技敌托邦从乌托邦、社会文化、伦理和理论基石等层面对技治主义展开了多维批判,为当代技术治理走向善治提供了诸多启示,有助于构建一个技术进步与人类意义协同演进、可持续发展的真实世界。

**【关键词】**科幻文艺;技治主义;敌托邦;技术治理

**【作者简介】**邬晓燕(1977-),女,浙江江山人,哲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科技治理与生态文明(北京 100044)。

**【原文出处】**《自然辩证法研究》(京),2024.2.1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技术治理理论问题研究”(21&ZD06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文明转型的协同演化研究”(21BZX051)。

20世纪末以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算法等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助推技术治理成为全球范围内公共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普遍趋势和主导范式,然而,数据鸿沟、算法歧视、平台霸权、数字利维坦等现象日趋严峻,暴露出当代技术治理社会误入技治主义歧途的风险境遇。回顾科幻文艺从早期萌芽到现代形态的发展历程,曾经以其主题纷呈的乌托邦愿景引领着现代技术治理社会的现实建构,但在20世纪却显现出一种忧惧晦暗的敌托邦叙事转向,聚焦于对技治主义的多元批判,折射出人类技术文化态度的深度变迁。应萃取现代科技敌托邦批判中深埋的思想火种,为推进不断走向“善治”的技术治理汲取思想启迪。

## 一、现代科幻文艺对技治社会的敌托邦批判缘起

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兴起发展和人们对现代科技承载、形塑人类未来的期望与日俱增,早期科幻文学与乌托邦小说交织生发出一条科技乌托邦分支,尽情描摹先进高效的技术社会理想愿景,更集中展现于20世纪现代科幻文艺的蓬勃发展。从培根

(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岛》(1627)、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1888)、凡尔纳的(Jules Verne)《机器岛》(1895)、威尔斯(Herbert Wells)的《现代乌托邦》(1905)到斯金纳(Burrhus Skinner)的《沃尔登第二》(1948)……构想出形态各异的技术治理社会,或是由“科学王”治理的所罗门宫,或是由先进机器系统链接的模范城市,或是技术管理和专家统治联合构建的世界性乌托邦,或是全面机械化的社会工程乌托邦,不胜枚举。然而,20世纪以来科幻文艺呈现出从积极乐观的乌托邦愿景到消极悲观的敌托邦魔景的鲜明叙事转向,彰显出人类社会对技术治理的社会心理取向从寄望走向忧惧的势变转轨,警示科技发展将导致人类社会沦陷于自由丧失、极权专制、全面异化的可怖景象。“敌托邦(dystopia)”这一术语是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穆勒的杜撰,意指一个比我们现在更为糟糕的想象世界。<sup>[1]</sup>科技敌托邦相信现代科技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控制将造成人与社会全面异化、自由丧失、专制极权的可悲后果,揭示出科技乌托邦试图建构人间天堂的努力将使人类

堕入无间地狱的可能性,亦即“一个人的天堂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地狱”<sup>[2]</sup>。科技敌托邦叙事浪潮奔涌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

### 1. 西方现代性建构的内在危机

西方近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的现代性建构逐渐暴露出诸多悖论与异变。源发于西欧社会的现代化运动开启了世界性的工业文明进程,西方现代化模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后发国家争相效仿的现代化模板。然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科技生产力、资本增殖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模式、物质主义的消费文化等工业文明范式,在20世纪中叶之后愈益面临合法性危机。以八大公害事件和六大污染事故为标志的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风险全面爆发,人口与资源压力、化学污染、能源危机、科技风险、地区冲突与局部战争等问题层出不穷,催生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及其工业文明范式的多视角批判和文明变革要求。一如1932年扎米亚京对《我们》的主题所进行的解释:敌托邦所揭示的往往是现代性的一些根本原则所带来的恐怖和压迫的结果。“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推到极致,从而使其自我暴露出它的虚妄和谬误。”<sup>[3]</sup>科技敌托邦叙事昭示出对建基于科技理性的现代性建构方案的否定或不信任,警醒人们对盲目的科技乐观主义和绝对的社会进化论要保持应有的警惕。

### 2. 乌托邦传统内部的思维反差

乌托邦理想社会建构因乌托邦传统中蓄积沉淀的内在矛盾逐渐显露而呈现出从正向思维模式向逆向思维模式的转向。乌托邦文学创作主题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古典乌托邦写作的理想瞩望,到近代乌托邦文学的现代性方案设计,再到20世纪敌托邦或反乌托邦小说对于现代性方案的反思和批判。20世纪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波诡云谲,使得完美幸福的社会理想设定显得苍白乏力,旧启蒙运动所树立的历史进步观、普遍历史观在残酷至极的世界大战的血泊中宣告终结。特别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西斯主义制造的惨绝人寰种族灭绝,核武器造成的巨大杀伤力和环境健康风险,苏联斯大林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的破产,动摇了人们对自由、理性、进步的人类未来信念,未来的不确定性成为普遍共

识,乌托邦文本被批评是“无根据的乐观主义”,粉碎了传统乌托邦对统一、集中、理性、计划的社会理想愿景,取而代之的是技术理性极端化推演的敌托邦愿景想象。但实际上,尽管敌托邦叙事表达了对于传统乌托邦理想和现代性方案的反叛,体现出对传统乌托邦描绘未来社会的和谐美满理想的“拒绝”与“否定”,仍然内在地熔铸着传统乌托邦的理想意蕴。<sup>[4]</sup>

### 3. 技术文明的发展困境

伴随着人类技术化生存的程度日益加深,技术文明的发展困境也日益显现。一方面,现代科技赋能社会治理、人类幸福的绝对能力遭到多面质疑,其生态和社会风险全面显现。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物质文明的进步,精神产品的丰富,大众文化的狂欢,但并没有带来传统乌托邦关于社会平等、人生幸福等理想愿景的如期兑现。相反,科技理性为人类征服自然、盘剥他人提供了“利器”,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物质浪费惊人,道德沦丧,娱乐至死,社会单向度化。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理性已经从批判武器和解放力量转变为维护统治和消弭创造的“意识形态”,全景监视的极权统治为现代人打造了无法逃脱的层层枷锁。一如马尔库塞所言,现代技术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统治系统,技术成为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更为新奇、有效和愉悦的统治形式,“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sup>[5]</sup>,作为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它使得既得利益者通过操控各种需要而有效阻止了社会反抗。世界风险社会的人类存在境遇深刻揭露出现代科技赋能性与致毁性并存的复杂特性,强有力冲击着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统治论的文化霸权,质疑着将技术合理性转变成政治合理性的技治主义逻辑。

### 4. 社会治理的民主化趋向

首先,20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社会剧烈动荡,动摇了乐于理想建构的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汹涌澎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体现出对现代主义的集体反叛和宏大叙事的无情解构,也激发出负向价值取向和逆向思维方式的敌托邦叙事,对现代社会尤其是极权主义形成更强大的批判力量和对个体自由个性解放提出更强劲的多维诉求。其次,科技政治加速合谋一体化的进程营造出一个悖谬性的事实:一

方面,大众工业和消费社会的兴起,逐渐消弭掉人们反抗阶级压迫和组织政治斗争的激情;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利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生命技术、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实施新型社会控制、经济掠夺和强权统治。人们担忧地省察出现代科技强大的社会形塑力与一种新式、高效的暴政之间的内在关联,极权统治正从模糊隐忧变成清晰迫近的现实。再次,核废料处置、环境污染、化工事故等科技与生态风险正加速全球扩散,在风险治理过程中暴露出现代公共决策中的知识依赖和专家依赖等技治主义倾向,科学技术不受限制的推进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在不断深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风险社会。建立在科学理性、技术效率、专业分工基础上的工业社会病入膏肓,面对层出不穷、复杂错综、因果叠加的脱域性、不确定性的重重风险,以及风险后果因知识、权力、财富等优势地位而转移的不平等性,知识-权力本位的传统威权型社会管理逐渐失去其合法性基础,消除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专家理性与公众理性的分裂,加强公众政治参与与协商治理,成为社会治理民主化的内在要求。

## 二、现代科幻文艺对技治社会的敌托邦想象

20世纪以来,现代科幻文艺丰产以机械主导、极权统治为主题的科技敌托邦叙事,涵盖从发达工业社会的极权统治危机、科技理性的失控危险、生态末世灾难、“造物主”的主体困境到人机交互社会的异化魔景等五大图景,以张力十足的文艺想象披露科技理性形塑人类社会的后果复杂性,审思技治社会运行的极致后果。

### 1. 揭示发达工业社会的极权统治危机

20世纪科幻文艺中的敌托邦叙事重点聚焦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极权统治危机,揭示出通信、媒介、监控等现代科技登峰造极,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政治统治和文化驯化,锻造出信息高度发达、物质极度丰裕、欲望无穷满足的发达工业社会,但是在营造井井有条、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制造出计划经济、同一思维、高度集权的极权主义社会。著名的敌托邦三部曲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我们》(1920)、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美丽新世界》(1932)、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1949),

全面刻画了现代技术理性所构建的“完美社会”对人性的压制和对社会的高压极权统治,“完美的控制社会”中对欲望的满足如何消解了欲望本身,科学的发展如何取消了科学的意义,“新世界”图解了现代性所建构起来的“乌托邦”如何变成了现代性的反动。<sup>[6]</sup>此外,科幻小说《华氏451度》(1953)、科幻电影《撕裂的末日》(2002)、《V字仇杀队》(2005)等科幻作品中,承载现代性梦想的乌托邦世界由于人道主义的缺乏与科技极权的实施,最终翻转为消灭自由思想、独裁专制残暴、流放人类未来责任的敌托邦地狱。科技敌托邦叙事通过审视技术治理社会内在压迫性的技术与人、人造物与自然物的矛盾冲突,批判呈现了技术治理的异化逻辑,即从提升人类本质力量、扩展政治空间、拓展人类自由的赋能工具转变成摧毁人类思想、维护极权统治的统治工具,警示人们高度发达的技术治理社会蕴含着无所不在的全景敞屏式监控、防不胜防逃无可逃的思想窥探和终极镇压等重重风险。

### 2. 警示科技理性的失控危险

伴随着专家统治运动的兴起和科技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度渗透,不同样态的科技理性失控危险愈益成为科幻文艺的关注主题。其一,通过刻画技术时代的疯狂科学家形象叩问科技理性片面张扬的危险后果。德国胶片电影《大都会》(1927)通过描绘科学狂人洛特旺,反映了蒸汽时代机器对人类的摧残迫害和阶层分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出品了《科学怪人》系列、《化身博士》和《飞侠哥顿》系列等大量恐怖、悲观和浪漫色彩的疯狂科学家主题电影;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2013)切切追思人类文明的病入膏肓,为科学理性极度张扬和人文艺术无尽衰落敲响了警钟。其二,反思科技理性与商业资本的合谋可能制造出一个反人道的科技社会。如美国科幻大片《逃出克隆岛》(2005)揭示了高新技术与商业资本合谋的非人道后果,更提出了克隆人的人权问题。其三,反思科技理性极度张扬滋生现代消费社会的幸福悖论。《美丽新世界》将“共有、统一、安定”的社会箴言设定为国家治理原则,运用科技手段实施享乐主义的“幸福治理术”,提供极度充沛的物质资源,鼓励疯狂消费和

寻欢作乐,但具有反抗意识、不愿沉迷于享乐而放弃思考与自由的几位主人公都遭到了放逐。“野蛮人”约翰悲怆的呼唤恰恰映射出现代享乐社会的荒唐悖谬,“我不要舒适。我要上帝,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美好,我要罪恶……我正是在要求不幸福的权利。”<sup>[7]</sup>

### 3. 忧惧生态末世灾难

科技理性张扬、工业文明危机、消费主义文化肆虐等资本主义发展危机与资源人口环境等问题交织叠加,加上二战结束后环境危机意识深化,助长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关于气候变化、生态灾难的生态敌托邦想象。劳伦斯·布爾(Lawrence Buell)概括了20世纪晚期生态敌托邦叙事的三个特征:“第一,设想人类对自然的剥削导致不可逆的环境恶化;第二,设想遭到干预的自然对人类发起反击;第三,人失去一切生路。”<sup>[8]</sup>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的《华氏451度》(1950)描述了一个科技高度发达、媒介影像俘虏人生的消费主义社会,自然的价值被异化为一种满足欲望的物质资源,同时这也是一个禁止人们感受自然、探索自然无穷奥秘的极权社会。<sup>[9]</sup>美国作家洛伊丝·劳里(Lois Lowry)的《记忆传授人》(2014)描述了一个按照科学教育和制度设计按部就班、精确运行的完美世界,这也是一个生态智慧被强行压抑、高度同一化的人造社区,气候变化和四季更替的生态循环都被人为干预和精确控制,自然的生态智慧被极权社会的纯粹理性所覆盖所抹灭。这些生态敌托邦实际上表达着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抗和对技术控制社会的担忧,“敌托邦语境中的生态书写,从哲学层面上来说是对人与其居所的存在关系的思考,从思想层面上来说是对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从文化层面上来说是对消费时代的欲望的反弹,是对唯理性主义的功利目的的抗拒”<sup>[10]</sup>。

### 4. 反思“造物主”的主体困境

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算法等科技的兴起,人类和机器人的关系、人作为“造物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等问题,成为现代科技敌托邦批判的新兴议题。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弗兰肯斯坦》最早提出了人作为造物主与其造物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核心主题,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的戏剧《罗素姆

的万能机器人》描绘了机器人劳动阶级起身反抗人类统治者的故事,而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则将机器人系列主题推向顶峰,《我,机器人》预见性地关注到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对抗冲突,并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原则,冯尼格特的《自动钢琴》将自动化视为罪恶的帮凶,把机器看作是危及人类的弗兰肯斯坦式怪物。科技敌托邦文艺批判展现了人作为“造物主”的主体困境的若干层面:第一,机器人从社会就业层面对人类的强力竞争和取代,进而随着机器人劳动力比人类劳动力更廉价更优秀,导致经济权力戏剧性地从劳动力转向了机器人拥有者;第二,机器人全方位接管了人类所有种类的工作,且能自我维持、自我进化,而人类沉溺于休闲娱乐,大脑退化,且对机器人产生强烈的情感依恋;第三,机器人进化出“自我意识”,决定接管地球并杀死所有的人类<sup>[11]</sup>。

### 5. 质疑人机交互社会的异化魔景

随着网络技术、大数据、智能算法、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全面升级和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的互联增生,人机交互的异化魔景成为现代科幻敌托邦热门叙事。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开创了“年轻、进攻型、异类和反传统”的“电脑朋克小说”的先河,其写作从一开始就粉碎了旧式科幻的技术崇拜,颠覆了自然与文化、有机与人造、人与机器等传统人文主义的等级化二元对立。<sup>[12]</sup>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执导的影片《头号玩家》(2018),视觉化地呈现了未来智能社会,但最终人们发现受数据和程序控制的虚拟世界只是一个情感与温度匮乏、日复一日机械循环的社会,根本不能够承载“互动世界、娱乐世界、资讯世界终将合而为一”的乌托邦梦想。《阿凡达》《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头号玩家》等科幻电影都呈现出一种“末世神话”的悲观主义倾向,反映出后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对生物科技、人机交互、太空科技等制造的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产生的“集体性认同危机”及其深度反思。《人工智能》(2001)、《机械公敌》(2004)、《终结者》(1984)、《黑镜》(2011)、《她》(2013)等影视作品反映出人类与人工智能相处中情感与爱的矛盾和身份认知焦虑,人-机混合体的发展面对着

“似人非人”和“非此非彼”的伦理困境和身份认同问题。正如当下舆论热炒的元宇宙,是否真的能够提供一个基于“第二人生(Second Life)”的“象征世界”,一个人类与媒介共生、人机融合、虚实相融的智能社会?

### 三、科技敌托邦对技治主义的批判进路

科技敌托邦文艺的批判对象与其说是技术治理(Technical Governance),不如说是技治主义(Technocracy)。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当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主张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中运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有效吸纳科技专家意见,从而提高政府治理效能、促进社会和谐、提升人民幸福。技治主义,又称专家政治或技术统治,是从20世纪20年代技术专家统治论运动发展而来的一种社会思潮,强调必须由科技专家领导、严格遵循科技理性进行国家建设,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性、专业性、效率性。敌托邦文艺的重要意义在于“并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作为一种介入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在被社会语境建构的同时,也建构着社会语境”<sup>[13]</sup>。这也是科技敌托邦文艺的社会影响和思想价值之所在,其对技治主义的批判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

#### 1. 对技治主义的乌托邦批判

科技敌托邦以一种逆反的乌托邦叙事构想出高度发达的技治主义社会无限制发展的可怕魔景,揭示出乌托邦蕴含的内在矛盾和逻辑悖论。它聚焦于科技对人类未来的影响、极权统治威胁、人性异化、生态危机等主题,在对技治主义社会的大胆想象和虚拟思想实验中表达了压迫-反抗、极权-自由、科技-人性、幸福-封闭等多组二元对立关系,揭示了科学乌托邦内部隐含的计划与自由、进步趋善与静态稳定、幸福理想与物化现实、人类与技术的控制与反控制等悖论,警示人们科技乌托邦试图建构人间天堂的努力将使人类沦落到无间地狱,一个极致技术理性化的社会将是人们无法面对的计划专制、自由尽失的机械王国。

第一,计划与自由的悖论。权力与秩序是乌托邦的孪生儿,严格按照科学方法、遵循技术理性进行社会发展规划,是科技乌托邦的典型设计,却也隐藏着计划与自由、理性与专制的悖论。迈克尔·温特

(Michael Winter)指出,技术理性的工具化、完美化必然导向邪恶的敌托邦,而敌托邦秩序往往不可逆转地分裂成控制与被控制的两个阶层。<sup>[14]</sup>第二,进步趋善与静态稳定的矛盾。科技进步是现代乌托邦社会的应然之义,但前者永不停歇的创新本性和自我批判特质必然挑战乌托邦社会静态稳定的统治秩序,最后发展成权力对科学的压制、自由对秩序的反抗。“只要科学还具有革新和改变社会生活条件的无限能力,科学与乌托邦的两难困境就依旧存在”<sup>[14]</sup>,最终结果只能是“乌托邦要么阻止科学发展,要么被科学所颠覆”。第三,幸福理想与物化现实的冲突。物质富裕、欲望满足、幸福自足的科技乌托邦中,隐藏着物化现实和人性泯灭,自然与传统丧失,爱与情感成为禁忌,科学和艺术的自由探索被禁绝,人成为履行消费功能、推动工业社会齿轮运转的同一化工具,如此一来,丧失人性、个性的幸福又有何幸福可言?第四,人类与技术的控制与反控制。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进步与福祉,还有恐惧和焦虑,尤其是智能技术的跃迁式发展更使人类的“弗兰肯斯坦情结”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与技术的控制与反控制问题直指人类自身的自我认同。科技敌托邦通过极致化的拟换性描写警醒人类,前瞻性地要求对科技理性的极端僭越进行理论反思、价值判定和伦理干预。

#### 2. 对技治主义的社会文化批判

科技敌托邦全方位诊断技治主义的思想症结,打破其社会改善论的文化承诺,揭示技治主义以科技理性奴役人性、以极权压制自由的社会统治逻辑。其一,打破技治主义植根于西方文化的社会改善论承诺。将科技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和乌托邦本身,将社会治理问题还原为科学技术问题,这种“社会向善论的乐观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顶峰。巴伯指出,进步与社会改善论是现代世界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观,归因于累积性的科学进步观,科技发展被尊奉为进步和社会改善的不竭源泉,“人类进步与科学思想就像是文明历史中两个可以互相取代的术语”<sup>[15]</sup>。然而,科技进步与人类美好生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通道,也不存在一种全知全能的科学能够建构起一个包含全部历史复杂性和文化多

样性的乌托邦。其二,揭示技术主义经由科技理性实施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全方位统治,是以自然性的抹杀、人性的泯灭、解放性的消解为代价的。《一九八四》展现的是一个物质极度贫乏、精神被高度控制的极权社会,但更可怕的是历史的停止、传统的消失、思想的消除。《美丽新世界》中预言了克隆技术、意识形态灌输、心理控制等科技手段从人类胚胎培育、阶层固化到精神控制的全方位统治,与之相伴的是对自然探索、家庭生活、情感关爱的隔离禁止。《我们》中描述了令人窒息的科学化管理、标准化生活、统一化时间管理,清除幻想的技术手段,以及“或者选择没有自由,或者选择没有幸福的自由”的所谓选择权。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理性将技术、自然、艺术、人都整合进统治领域,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就是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有效操控,“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sup>[15]27</sup>。

### 3. 对技术主义的理论批判

科技敌托邦揭示技术主义存在多层面的价值冲突与伦理难题。其一,技术主义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可能性与伦理可行性的内在冲突。科技敌托邦推崇用科学秩序和技术控制来操纵社会运行,以一种普遍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同一性的人性预设为前提建构一种人类理想未来,必然会导致自由与奴役、秩序与极权、幸福与封闭等悖论。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指出,“乌托邦的概念依赖于人本质上应该是和可能是的那种东西与人在生存中即在现实中所是的那种东西之间的差别”<sup>[16]</sup>,但乌托邦的技术可能性不等于伦理可行性,科技合理性无法保证人类具有最大幸福和崇高道德,科学之真与伦理之善不具有必然的顺推关系。其二,技术主义崇尚的效率主义和利益最大化两大原则迫切要求人类对现代技术增强伦理治理。现代科技的负效应典型地印证了弗洛姆对现代技术发展两个坏的指导原则的严厉批评,即“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都应该做”和“追求最大的效率与产出”。当人类从自然选择、自然生存阶段进入技术选择、技术生存阶段,科技巨大的力量呼吁人类发展出与之相匹配的强大的道德关怀和社会责任,迫切要求保证社会的容纳力与科学的增长相平衡、伦

理智慧与科学力量相适配。其三,专家系统作为技术主义的代理人,日益“从理性知识的探求者变成产业集团的依附者、从理想道德的立法者变为现存秩序的阐释者、从专横权力的批判者成为政治权威的代言人”<sup>[17]</sup>,技术主义加剧着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专家系统与公众认知的割裂,极大降低了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民主社会的公信力。

### 4. 对技术主义的理论基石批判

科技敌托邦剖解技术主义的理论基石——科技决定论的贫困,批评技术决定论的理性狂妄和技术自主论的责任放逐。科技决定论是贯穿科技乌托邦和科技敌托邦叙事的理论基石,它们坚信“技术的增长和扩张将带来乌托邦;乌托邦将是一个全面技术化的社会,一个由技术操纵和从某种意义上为了技术的社会”<sup>[18]</sup>。科技乌托邦的先驱培根对自然科学作为最重要的公共事业充满信仰,站在现代科学的开端,依托在自然面前获得绝对自由的科学共同体,意欲建构一种科学统治的理想政制,但是,他忽略了一点,“科学无法为人类提供道德标准,无法提供政治生活需要的正义和节制”。比如,萨罗门学院的元老在公布新的发明之前,要确定哪些可以公之于众,哪些应该保守秘密,适合公布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培根在开启科技乌托邦的同时,也为科技乌托邦的未来发展埋下了冲突的种子。<sup>[19]</sup>林林总总的科技敌托邦叙事层层剖解科技决定论的贫困,不仅体现在认知层面,如普特南所言,科学的成功将现代人催眠到除科学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sup>[20]</sup>;而且体现在自然开发和经济层面,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是一种解蔽、一种促逼,向自然提出不可理喻的要求并对其实施全面控制,人则被技术经济变成生产-消费物;更体现在文明层面,如埃吕尔所言,自律自主的技术制造出一个无所不能、拒斥一切传统的技术文明,即“出于”技术、“为了”技术和完全地“在”技术中<sup>[21]</sup>。而科技决定论的最终宿命必然导向技术自主论的责任放逐,生物统计学、社会统计学、心理分析学、控制论、媒介传播学等“人类技术”的普遍应用,“集权式地”将人变成一种服从合理技术秩序、认同“被炮制”的集体需求、消弭批判意识的机器,建立在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基础上的快乐经

济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治理术,人成为技术之囚,技术社会身患不治之症,自由消逝,人类放弃抵抗,放逐责任。

#### 四、对当代技术治理走向善治的若干启示

现代科幻文艺中关于自动机器、丰裕社会、专家政治等诸多乌托邦愿景已成为当代科技社会的生活常态,而其关于消费社会、生育控制、思想监控、技术官僚等敌托邦隐忧也以不同形式的变换样态呈现在当代社会治理情境之中。信息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渗透和浸染社会治理和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指数增长的数据加持、智能便捷的数字政务、精准定位的算法推荐,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高效、便捷、丰富的人类生活世界,魅惑人们沉沦于虚拟现实世界、迷失于数字民主幻象、耽溺于泛娱乐化的数字意识形态,在流光溢彩的数字乌托邦愿景中自愿放弃批判性思考。现代科幻文艺从乌托邦向敌托邦的思想流变,警示人们关注科技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复杂性和风险性,警惕技术治理有滑向技治主义的危险,应从科技敌托邦批判中汲取合理教益,对技术治理施行前瞻性的风险规制和价值引导,推动当代技术治理走向多元善治。

##### 1. 秉持技术治理的审度取向

20世纪初的科学管理和专家政治两股思潮和运动,在新兴智能技术的多方联结助力下,在当代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掀起轰轰烈烈的技术治理热潮。技术治理主要通过社会测量、计划体系、智库体系、科学行政、自然与社会工程等技术策略,进行社会财富的调查统计、国家和社会生产和分配活动的统一配置安排、政治权力的专家政治、企业和组织的科学管理、开展各种综合性大工程等活动<sup>[2]</sup>,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也滋生了技治主义的极端化倾向。技术治理的“风险”与“福利”如影随形,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医疗、生产、安全等领域的当代技术治理实践,渐次暴露出化简逻辑下信息失真、技术官僚化加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算法专制、公民参与不均衡性等困境,也因此提出了技术治理的合理性与有限性等问题,引发技术治理与反技术治理的激烈纷争,亟需明确立场、推进实践。

须确立技术治理的审度取向,走出辩护与批判

的两极对立思维,协调好技术赋能与技术负能的矛盾。刘大椿先生指出,如何看待科技的社会影响,辩护导向的科学主义和批判导向的反科学主义都有各自的局限,应当采取一种多元互补的科技审度观,在客观性与独特性、普遍性与地方性、理性与非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sup>[23]</sup>一方面,应当肯定科学原则和专家智库作为技术治理的基本工具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社会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大力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促进权力分配格局的民主化,实现数据共享、信息互联、精准治理、权责共担等社会治理目标。另一方面,警惕技术理性对可操作性、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将不断加剧社会发展单向度化的风险,推动制定技术治理的总体性治理框架和一般性伦理原则,建设技术治理的问题集与数据库,为当代技术治理实践提供战略性指导和行动指南。

##### 2. 为技术治理注入乌托邦精神

一方面,须重新发现和大力弘扬批判现实、建构未来的乌托邦精神。培根《新大西岛》所开辟的科技乌托邦分支在不同科技领域主题之下繁荣绽放,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激进的乌托邦式的愿景和政治实践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系统控制中失败”,正向批判的科技乌托邦逐渐失语,并向逆向批判的科技敌托邦转变。关于敌托邦叙事在乌托邦领域的影响和意义,学界存在立场争议,如莫兰认为20世纪50年代敌托邦文学兴起是批判性揭示资本主义的反人道性和环境破坏力,并在现存社会体系的潜在结构中发掘反抗的种子,但有学者认为敌托邦叙事通过构想高度发展的科技社会极权主义命运和自由创造性的泯灭,实际上是抛弃传统乌托邦批判现实、建构未来的乌托邦精神,劝导人们接受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沦为保守的意识形态维护。不过,基思·布克尔(Keith Booker)在《现代文学中的敌托邦冲动》中为敌托邦正名,谈到“敌托邦冲动”是一种社会批判的冲动,内在必然蕴含着一种“美好”的乌托邦构想,这不仅是因为一个人的乌托邦是另一个人的敌托邦,而是关于理想社会的乌托邦天然地暗示着对现存的、不理想的事物秩序的批评,反之,警示着危险的、“邪恶”乌托邦的敌托邦也在构想着一

个更美好社会。<sup>[24]</sup>实际上,乌托邦与敌托邦都是大写的乌托邦(Utopia)思想内部中的未来构想,乌托邦代表乐观前景或正值思量,敌托邦代表悲观前景或负值思量,乌托邦-敌托邦逻辑旨在作为思想实验,或者引导读者走向理想,或者把读者从噩梦中唤醒,二者都承载着弥足珍贵的乌托邦精神,是创造更美好未来的勇敢尝试。

另一方面,应当为当代技术治理注入兼具批判和建构向度的乌托邦精神。20世纪下半叶以来乌托邦的式微导致现代社会沦为当下的延伸,当代技术治理存在被泛用滥用于各种社会事务、杂务中的不良趋向,和被简化为技术化应用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误区,背离了其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呈献理想引领的初衷,更缺乏对技术治理本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批判省思。因此,应当超越科技乌托邦与科技敌托邦两极对立的思维误区,在情境复杂的当代技术治理实践中弘扬理性批判、超越现存的乌托邦精神,根据历史发展状况恢复和重建人类实践活动的乌托邦维度,为深陷社会事务沼泽中的技术治理提供具有批判、前瞻和超越向度的愿景引领。此外,应克服传统乌托邦理想蓝图的静态性、单一性等缺陷,发展出一种自我反思性的“批判的乌托邦”,前瞻性地构想一种动态适应、持续发展的替代性世界图景,引领人类未来趋向一种“更美好”而非“完美无缺”的技术生活世界。考夫曼认为,乌托邦可能基于社会背景 and 不同情势而具有不同外形和结构模式,但所有的乌托邦表达都是人类追求社会理想的总体倾向的产物,“乌托邦的价值就在于,它们高举崇高的社会理想,防止人类陷入静止或停滞的状态并满足于卑贱的生活现实。它们指向道德和物质进步的更高目标,并由此引导人在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大道上前进。”<sup>[25]</sup>

### 3. 推动技术治理的多元共治和价值融通

一方面,应优化技术治理的多元共治机制,推动以技术为中心的技术治理与以治理为中心的技术治理的协同共治。在当代技术治理实践中呈现出以技术为中心的技术治理与以治理为中心的技术治理的形态割裂。以技术为中心,强调的是技术治理的客观性和标准化原则,视效率与收益为治理目标导向;以治理为中心,强调的是技术治理的主体多元性、价

值差异性、利益冲突性,视公平与和谐为治理目标导向。当代技术治理存在技术的规范统一性、标准一致性与治理的主体多元性、场景复杂性之间的内在矛盾,且以技术为中心的技术治理占据垄断优势,日益显露技术治理的孤岛效应、物化倾向、集权趋势,惯于将伦理问题与责任问题转换为纯粹的技术问题。<sup>[26]</sup>在科技风险治理和科技治理再治理的过程中,既要贯通责任伦理以塑造全过程全领域的负责任技术创新,又要克服重专家建议轻公众意见的技术官僚化倾向,优化技术治理多元共治机制,促进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融通,坚守技术“有所为”与“有所不为”,让技术治理在科学性与人文性、效益性与道德性中保持合理的张力,推动以治理为中心的技术治理与以技术为中心的技术治理的“软”“硬”结合、协同共治。

另一方面,重新定义人的本质规定,推动技术治理的价值融通。必须认识到,技术发展与社会治理本质上是双向互动共生的关系,治理的本质应当是引导,而治理的终点是“善治”,即国家与社会为实现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而构建起的一种最佳关系。<sup>[27]</sup>苏恩文在比较科幻小说的三种世界性范式时指出,阿西莫夫的正题是“人是有限性的,因此不可信赖”,叶弗里莫夫的反题是“人是无所限制的,因此必须给予信赖”,而莱姆提出了一个超越二者的辩证性合题,“虽然人有着最大的局限性,但依然要给予信赖,因为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并能够缓慢而艰难地向一个更高的水平不断进化”<sup>[28]</sup>。在当今技术治理时代,我们应跳出乐观主义的科技乌托邦和悲观主义的科技敌托邦的两难选择,尤其是正视算法治理和 ChatGPT 等生成性人工智能提出的“重新定义人类”的挑战,创新界定人的本质规定性和未来可能性,推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协调、技术治理与伦理治理的协同、专家决策与公众认知的融合,最终实现科技与人文、经济与生态、事实与价值、效率与道德齐头并进的“善治”。

### 4. 全面激发技术治理的人类解放潜能

现代技术,具有“阿拉丁神灯”和“潘多拉魔盒”的双重特性,这是技术文明演进中一以贯之的矛盾,

也是技术文明守正创新、立破并举须面对的挑战。一方面,应转换思维看待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对人类发展的多方“围困”,积极挖掘其促进人类解放的创新效能。譬如,人工智能对单一性、重复性的就业岗位的替代,推动了智能时代的社会结构重组和公民数字素养提升;生成性人工智能发展对人类主体性地位的挑战,促使人类深入思考人类价值的剩余清单、人类进步的未来前景、幸福生活的多维向度。另一方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加快完善技术治理的价值引领、伦理规制和法治建设,全面激发和释放技术治理的人类解放潜能。一是在发展观层面,以人类世视野看待全球范围内人类对地球物理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全面改造,从而倡导一种世界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引领技术治理的整体主义导向。二是在技术治理实践层面,多方推进数字技术、媒体技术、人工智能在贫困治理、就业拓展、劳动教育、科学素养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生态意识培育、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等全领域全环节的应用,激发社会发展的创新活力、选择空间,以人本逻辑遏制资本逻辑,以价值引领和审美解放消除物化困境,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克服主体失位的新型奴役状态。总而言之,从现在开始更正人类的技术文明发展规划,构建一个与人类价值观相匹配、与人类核心价值对齐的技术文明,一个技术进步与人类意义协同演进、可持续发展的真实世界。

#### 参考文献:

- [1]Kumar K.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M].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447.
- [2]邬晓燕. 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建构与解构[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30.
- [3]谢江平. 反乌托邦思想的哲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66.
- [4]姜文振. 反乌托邦小说之“反”的二重性论略[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109-115.
-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6]赵柔柔. 反乌托邦的诞生[J]. 文艺理论研究, 2019(1): 47-54.
- [7][英]奥尔德斯·赫胥黎. 美丽新世界[M]. 陈超,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174.
- [8]Buell 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M].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95: 308.
- [9]Bradbury R. *Fahrenheit 451*[M].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1: 144.
- [10]谭言红. 北美敌托邦小说的生态书写[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6): 128-133.
- [11][美]拜伦·瑞希. 人工智能哲学[M]. 王斐, 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20: 66.
- [12]黎婵. 科幻理论中技术文化批评的兴起[J]. 外国美学, 2020(1): 181-199.
- [13]邓林. 《美国队长: 内战》: 反恐叙事的表征与重写[J]. 电影评介, 2016(20): 47-49.
- [14]Mendelsohn E, Nowotny H.(eds.)*Nineteen Eighty-Four: Science Between Utopia and Dystopia*[C]. Dordrecht, Holland: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 [15][英]凯文·罗宾斯, 等. 技术文化的时代: 从信息社会到虚拟生活[M].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60.
- [16][美]保罗·蒂里希. 政治期望[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181.
- [17]肖滨, 费久浩. 政策过程中的技治主义: 整体性危机及其发生机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3): 88-93.
- [18]Segal H P. *Technological Utopianism in American Cultur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21.
- [19]王双洪. 现代乌托邦的科学寓言: 培根《新大西岛》中的政治、宗教与科学[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6): 144-150.
- [20][美]普特南. 理性、真理与历史[M]. 童世骏, 李光程,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186.
- [21][荷]E. 舒尔曼. 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 李小兵,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 121.
- [22]刘永谋. 构建审度的技术治理理论[J]. 民主与科学, 2019(5): 52-57.
- [23]刘大椿. 科技审度论: 通向多元开放的科技哲学[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3(4): 1-12.
- [24]Booker M K. *The Dystopian Impulse in Modern Literature* [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4: 15.
- [25][英]鲁思·列维塔斯. 乌托邦之概念[M]. 李广益, 范轶伦,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19.
- [26]刘慕齐, 唐伟杰. 赋能还是负能: 技术治理基本趋势辨析[J]. 科技传播, 2022, 14(21): 109-113.
- [27]俞可平. 治理和善治: 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 南京社会科学, 2001(9): 109-113.
- [28][加]达科·苏恩文. 科幻小说面面观[M]. 郝琳, 李庆涛, 程佳,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 253-254.